

论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 武汉 430073)

摘要:面对日益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生态危机,形成了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和以现代人类中心为基础的“浅绿”思潮,他们分别提出了单纯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方案。他们的生态治理方案对于缓解全球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理论立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其理论的抽象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并由此形成了要求解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占有、使用、分配利益矛盾的“环境正义”运动。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通过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形成了以“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提出了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和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这一生态治理观的特点是以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追求,通过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尊崇自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来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克服了“深绿”和“浅绿”思潮生态治理观的各自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使其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发展观和境界论内在统一的鲜明特色,对于实现当代生态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深绿”和“浅绿”思潮;环境正义;生态治理观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4-0005-10

面对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如何进行生态治理,在西方世界展开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他们在生态治理问题上的分歧根源于其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对生态危机根源的不同认定。与上述理论层面的争论相联系,形成了单纯的德治主义路向、技术主义路向和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多中心论路向的生态治理方案。上述生态治理方案对于缓解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理论立场和理论自身的局限,上述方案却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正是基于对“深绿”和“浅绿”思潮缺陷的反思,西方世界出现了追求环境正义为目标的生态运动,其特点是要求把合理协调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作为生态治理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力图避免西方生态治理方案的局限,提出了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科学认识和评判上述不同的生态治理观的区别和价值,对于推进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深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治理观的缺陷与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

西方生态思潮是伴随着当代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以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生态科学所揭示的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规律为生态哲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生态哲学对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分的机械世界观和主体性哲学提出质疑,强调整个世界是相

收稿日期:2018-04-26

作者简介:王雨辰,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兼职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8VSI013)阶段性成果。

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而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发展趋势又使如何克服资源短缺的问题成为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正是在上述理论和现实双重背景之下,西方生态思潮得以形成和发展。其突出特点就是强调要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克服近代机械世界观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颠覆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以外的存在物上,由此形成了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在“深绿”生态思潮看来,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及其运用,这就意味着克服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从而恢复人类对自然的敬畏。由于“深绿”思潮把科学技术进步与运用也看作是生态危机的另一重要根源,因此,他们把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看作是矛盾的关系,由此他们所主张的生态治理论的核心是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到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转化,并限制科学技术运用和追求经济增长。认为只要实现了生态价值观的转换,并辅之以人们生存方式的转换,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根本解决,他们的生态治理论秉承的是单纯的德治主义观点,追求的是保证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

与“深绿”思潮相反,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则认为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和目的在于捍卫人类的利益,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不存在问题,更不能对之加以否定。问题只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着缺陷,只要对这一缺陷加以修正即可避免生态危机,“浅绿”思潮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了修正。具体说:一是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在论证人类的价值高于地球其他存在物的价值的同时,强调正是由于作为目前地球生物进化的顶点的人类的实践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影响,这就要求人类由此应该担负保护地球生态共同体和谐的更大的责任,从而避免人类实践行为对生态系统的伤害;二是通过区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专制主义”,提出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所谓“开明的人类中

心主义”就是强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支配和改造自然,但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客观上要求人们克制自己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这就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支配应当是有责任的改造和支配;三是把人类中心主义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类型,提出要否定和抛弃“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而采纳能够避免生态危机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所谓“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满足人类个体的任何感性偏好作为价值标准,而不论个体感性偏好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问题。这种“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人们在追求和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望时,而不顾及其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必然会激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所谓“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是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所呈现出的合理的需要,只有坚持“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在“浅绿”思潮看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问题并不在于其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利用,而在于把这种支配和利用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人类专制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从而忽视了人类保护自然的责任。因此,需要通过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上述修正。“浅绿”思潮反对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从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的出发,其生态治理论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分配自然资源,并辅以技术革新和严格的包含预防和惩罚机制的环境政策来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秉承着的主要是技术主义的观点,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之间既存在理论分歧,也存在着理论共同点。其理论分歧主要在于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认定以及以此为基础如何看待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深绿”思潮看来,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拒斥科技创新、运用和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其理论“缺乏对现代大

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①“浅绿”思潮强调造成生态危机根源的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人类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和根本目的是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就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如何看待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是“深绿”和“浅绿”思潮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深绿”思潮看来,虽然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能够解决经济增长和贫困的问题,但是在有限的地球生态系统中,技术革新的解决方案不能提供在一个现有系统中走出无限增长的道路,也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浅绿”则强调既然有内在缺陷的现代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那么开发更好的技术和实现技术创新就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浅绿”思潮在生态治理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就是建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预防和治理环境政策,并辅之以市场和政府的多元主体的参与,通过惩罚和生态补偿的方式,以提高生态效率和治理生态问题。他们所谓的“预防机制”,主要是指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政策促使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态效率,赢得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后果,并把这种新技术加以市场化,推广到其他企业和国家;他们所谓的“生态补偿机制”本质上属于一种末端治理机制,就是通过制定严格的生态补偿制度,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增加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迫使企业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深绿”和“浅绿”思潮理论的共同点是拘泥于从抽象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的探讨。对此,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批评西方绿色思潮“忽视了对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或者简单地采取‘人’将不断取代自然这种必胜论的观点),因此,切断了社会理论与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反应之间的真正联系”。^②“深绿”和“浅绿”思潮之所以忽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实际的物质能量交换

关系的考察,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具体说,第一,他们的理论主要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视角探讨生态危机,而缺乏社会政治维度的分析,致使他们的理论缺乏对人类社会和自然在一定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第二,“深绿”和“浅绿”思潮所秉承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使他们都无法从社会生产方式的维度探寻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危机的真实根源,仅仅归因于人类生态价值观的问题,从而都陷入抽象的文化决定论的失误之中。从人类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生态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造成本国的生态问题,而且还通过殖民扩张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从生态危机发展的现实看,正是由于资本全球化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对当前的生态危机负有主要责任。而“深绿”和“浅绿”思潮对生态价值观的探讨虽然对于人类反思实践行为的后果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撇开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不仅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推卸环境治理应负的责任,而且让所有人承担主要由资本和资本全球化引起的生态危机的后果,这显然有违而且也冲淡了资本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有违环境正义的原则,无法正确处理人类实践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环境问题,暴露了其理论过于抽象性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大缺陷。如何真正解决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就成为当代生态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形成了当代世界的“环境正义”运动。

“环境正义”起源于美国,并迅速向全球传播。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将有毒工业垃圾全部倾倒和掩埋到该州的瓦伦县,该县主要居住的是非洲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白人。1982年在联合基督教

①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②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会的支持下,该县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而第一次将种族、贫困与环境污染联系起来,由此引发了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运动在 1987 年和 1991 年分别发表了《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报告和确立了环境正义的 17 条原则,并迫使美国克林顿总统在 1994 年颁布了“联邦政府针对少数民族与低收入人民的环境正义议题之行动”的行政命令,规定所有联邦政府都应当把维护“环境正义”列为主要任务。如果说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主要关注的是环境污染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关系的话,环境运动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穷人环保主义”运动,其标志是 1994 年印度生态主义者 R·古哈发表的《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评论》一文。该文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特权阶层的过度消费;二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军事化。他以印度为例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运动与发达国家的环境运动存在着两方面的不同。具体说: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受环境问题的影响最深,他们面临的是如何谋求生存,而不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二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平等以及经济和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古哈的上述观点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激烈反应,并逐渐形成了以维护生存为目的的穷人的环保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环境资源的分配正义,反映的是资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占有、分配和使用生态资源上的矛盾利益冲突。“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既显示了“深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脱离生态利益矛盾探讨生态治理的抽象性的缺陷,这突出体现在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全球化运动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本质的联系,但“深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却立足于中产阶级和资本的利益,要求所有人必须承担生态危机的后果,显示全球环境治理必须找寻新的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从哲学

本体论上提出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概念,主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提出了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通过技术创新和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已有的生态文明理论,对实现当代全球生态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习近平“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以实践为基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自然制约着人类实践,自然始终对人类实践具有优先地位,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人类根据自己的目的改造自然,并使自然越来越走向人化。正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人类和自然实现具体、历史的统一关系,展现为“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有机统一发展过程。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述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原理,提出了“生命共同体”概念。“生命共同体”概念不仅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且强调保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应当坚持自然和生态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因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①。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以保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只管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有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②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习近平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并在考察人类历史上因违背自然规律,改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版,第 85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85—86 页。

造和开发自然造成的恶果的基础上,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①。“生命共同体”概念集中表达了习近平的生态哲学世界观,是其生态文明理论的哲学基础。

正是在“生命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上,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建立在牺牲环境基础上的现代化不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这种现代化势必使人民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②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③。“生命共同体”概念不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共生关系,而且也体现了生态哲学的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并把这种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贯彻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正是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

所谓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就是要克服单纯的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观,既要求在全社会树立爱护生态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提升人们坚持生态文明理念的道德自觉,又要通过制定严格的生态制度、生态法律法规在外在方面硬性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任何目标的实现,任何规则的遵

守,既需要外在的约束,也需要内在的自觉。”^④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的本质就是内在外在制度硬性约束与道德自觉的统一。由于对保护生态的认识存在一个由浅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发展过程,树立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观对实现这一转变过程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论述这一点,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展开了创造性转换。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不仅体现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上,而且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贵和”。“在确立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方面,中华文化有其优长之处。……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⑤这种“和合”文化形成了“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⑥正是在上述“和合”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我国的先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习近平进一步分析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虽然文化是由经济所决定的,但任何经济发展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人文价值,从而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其他动物的谋生行为区别开来;第二,文化通过增强不同主体间的沟通 and 交流,增强人们对经济活动的组织能力;第三,文化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扩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20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09页。

④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⑤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296页。

⑥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第296页。

大劳动对象,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可以看出,任何经济发展都要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文化为社会进步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基于以上认识,习近平非常重视在全社会确立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甚至把能否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看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强调“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①。只有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才能实现从外在自发到内在自觉的转变。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而且还需要制定严格的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从外在方面硬性规定人们的实践行为,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规则”。对此,习近平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并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受到惩罚”^②。习近平这里所讲的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法治,主要是指建立严格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考评体制以及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变革。具体说:第一,在习近平看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保证就是建立公平正义的自然资源使用制度,合理协调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使用和分配上的矛盾利益关系,实现环境正义;第二,通过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就是要“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③,从而切实保障生态受损地区的权利;第三,习近平强调应当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和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在他看来,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并不

是要否定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而是要摒弃那种以牺牲生态环境追求一时的发展,摒弃那种单纯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树立生态生产力观,要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追求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与之相应,要破除唯GDP的政绩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④习近平甚至提出了应当把生态环境指标的好坏作为对干部考核的“一票否决”;对于环境责任,习近平主张建立环境责任追究制度,他强调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⑤第四,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以及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的原则,建立健全的自然资源及资产管理制度和监管制度,既落实自然资源的所有人的权益,又统一规划国土资源的利用和统一行使自然资源使用的管理,使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人和管理者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习近平所提出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的特点是既通过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文明的制度从外部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又从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价值观建设的角度提高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自觉,从而达到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不仅关注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导,遵循环境正义的原则,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态利益矛盾,通过技术创新和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

① 习近平:《之江新语》,第4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09页。

③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第19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99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10页。

发展道路,解决当代全球环境问题和实现共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习近平于2015年在联合国第70次联大会议上的演讲中系统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就是要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通过建立公正公平的安全秩序和开放创新、互惠互利的共同发展,来解决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全球性问题,最终建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世界。习近平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进一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提出了通过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以包容、共享和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要求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各民族国家应当放弃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思维,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通过构筑尊崇自然和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并把全球环境治理与全球共同发展、落后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习近平所提出的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的全球治理方案,一方面强调各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当从保护地球这一人类唯一的家园问题上通力合作,强化同舟共济的思想,承担起全球环境治理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又从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和各民族国家不同的发展水平出发,认为各民族国家对全球环境治理所负的责任应当是有差别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环境正义。“有区别”的责任并不是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而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多作表率,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重要原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愿”^①。之所以全球环境治理必须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是因为不同民族国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是不同的。具体说,

从全球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既造成本国的生态问题,又通过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开拓,造成被殖民国家的环境问题;从全球环境问题的现实看,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资本所主导的,资本利用其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不公正的国际分工掠夺和剥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再加上资本的全球化使得环境问题呈现出全球扩散的趋势。因此,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是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理应承担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具有全球环境治理的条件和优势,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承担主要由发达国家所制造出来的环境问题,而且面临的是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缺乏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资金和技术。这就决定了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必须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通过合理协调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在环境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践行“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实现公平正义。习近平所提出的全球环境治理方案不仅要求践行公平正义“环境正义原则”,而且还要求把全球环境治理与世界共同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习近平指出,一方面,全球环境治理不应妨碍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要,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应遵循合作共赢的原则,通过交流、对话与合作,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倡导和践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包容、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方式,使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转换到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从而建设一个美丽清洁的世界。

三、习近平“德法兼备”的 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的 理论特质与价值

习近平所提出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132页。

态治理观,无论就其理论基础,理论内容,还是就其理论的价值取向,与“深绿”“浅绿”思潮相比,都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质,对于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从理论基础看,“深绿”思潮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把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浅绿”思潮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哲学;而习近平的生态治理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吸收当代生态科学成就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化。

“深绿”思潮根据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规律,提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要求破除以人类需要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这种从自然科学的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伦理学的价值判断,为了解决“是”和“应当”之间的关系的难题,他们最后诉之于人的“体验”和“道德境界”的提升,必然导致其理论的相对性和神秘主义,无法保证其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同时,“深绿”思潮撇开社会制度维度,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寄希望于通过生态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变革,结合地区生态自治来解决生态危机,支撑其理论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其理论目的在于维护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浅绿”思潮主张修正以满足人的感性欲望为基础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代之以“人的理性欲望”“人类整体利益”“人类长远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人类长远利益”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利益,其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哲学,其理论目的是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为基础,并结合生态科学的系统性、整体性规律,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和合”思想展开现代转换,肯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和諧共生关系,通过走生态文明发展道

路追求可持续、协调和绿色发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以人民为中心”是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基于以上价值追求,习近平反复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中国美丽。”^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归宿、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与“深绿”和“浅绿”思潮有着根本区别,形成上述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同的理论基础。

第二,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克服了“深绿”和“浅绿”思潮在人类和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的缺陷。“深绿”和“浅绿”思潮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前者坚持“地球优先论”,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后者强调人类的利益是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和目的,把人类置于自然之上。他们都割裂了人类和自然的辩证关系,无法真正分析人类与自然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始终坚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指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既肯定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利用和改造自然,又要求人类实践活动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强调“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②。

第三,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克服了“深绿”“浅绿”思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之间关系认识的缺陷,使生态文明理论能够作为一种发展观落实于现实生活。“深绿”思潮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技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09—21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07页。

术进步与运用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进而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和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否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与运用,他们由此提出了否定技术进步和运用以及“经济零增长”和“稳态经济”的解决之道;“浅绿”思潮虽然肯定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强调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开发出更好的技术的必要性,但他们所说的经济增长却是以资本追求利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他们所说的技术进步与运用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这就决定了建立在资本追求利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与运用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要否定经济增长,而是要否定那种大量投入资源、劳动要素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①在谈及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时,习近平强调要把全球环境治理与全球共同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有机结合起来,只不过这共同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都应当建立在尊崇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基础上的绿色发展的基础上。在追求绿色发展过程中,习近平反复强调摒弃靠要素投入有损生态环境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绿色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我国经济主要靠资源等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造成了经济发展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不优的结果,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继续按照这种方式来谋求发展,即便把全球全部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摆脱上述困境的出路就在于“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方向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②。在论及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时,习近平进

一步指出,各国在解决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同时,“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③。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一方面把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他还进一步通过论述“真发展”和“好发展”来阐发他的上述观点。“深绿”思潮否定经济增长,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对立起来;“浅绿”思潮肯定经济增长,但他们肯定的是以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经济增长,因此不是“真发展”。而习近平所追求的“真发展”不是建立在放任资本追求利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有违公平正义的发展,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发展;所谓“好发展”,就是指不是以要素投入为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单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不协调的发展;而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尊崇自然的协调的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要求把生态文化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建设和制定生态保护制度、生态法律法规有机结合起来,把外在的强制规范和内在的道德自觉有机结合起来,克服了“深绿”和“浅绿”思潮单纯的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治理观的局限。习近平把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和法律法规看作是保护生态的底线规则,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最严格的法治。习近平这里所说的生态保护制度既包括规范人们使用自然资源的硬性制度,而且还包括合理协调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占有、使用上的利益矛盾,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平和正义,内在地包含环境正义的维度。习近平把能否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观和生态道德观,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全社会扎根,看成是能否把生态文明建设从外在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1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20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42页。

强制转变成内在自觉的关键。同时习近平又根据全球化的现实,提出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各民族国家通过对话与合作,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实现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国际环境正义。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既强调生态制度和生态法律、法规建设,强调生态文明建设

不能脱离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要有利于实现真发展和好发展;又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生态文化道德价值观建设和道德境界的提高,克服了“深绿”和“浅绿”思潮单纯的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观,这也意味着习近平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作为发展观和境界论内在统一的鲜明特点。

The View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tegrated with Morality and Law

Wang Yuchen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growing globalization, the “dark-green” ideological trend based on ecocentrism and the “light-green” ideological trend based on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academia, which have put forward their ecological governance plans characterized respectively with pure moral rules and technicism. Their plans for ecological governance will exert a certain positive influence on easing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However, it cannot fundamentally re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because of its Occidentalist theoretical position and abstractness in theory. Therefore,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has been formed to require solving the conflicts in the possession and us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as and groups of peopl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theor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and nature, and by realiz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wisdo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forme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view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life”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and put forward the view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tegrated with morality and law”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rict 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in the whole socie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ew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is to regard the re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its value pursuit, and to adhere to the innovation-oriented technology and the respect for nature to achie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Xi’s view has not only overcome the one-sidedness and limitation of the “dark-green” and “light-green” ideological trends, but also manifested the inner unif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view and the realm theory, which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over the re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governance.

Key words: “dark-green” and “light-green” trend of thought, environmental justice, view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刘曙光)